

空间的再造：一个超大城市的诞生

程士强

内容提要：超大城市的治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大卫·哈维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对于在理论上认识超大城市的本质特征和在实践中开展超大城市的治理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哈维在书中展现了19世纪后期资本和权力对巴黎的空间改造，从而呈现了现代性和城市性的空间面向。现代巴黎作为超大城市的代表，是城市性的集中体现，更是高度现代性的典型表征。这个空间不仅是现代性与城市性存在的场所，更是现代性及城市性本身。哈维重现了现代巴黎的形成过程，揭示了资本和现代性如何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结合在一起，以及社会关系与政治想象如何因这种结合而被启动。通过对巴黎的分析，哈维强调了超大城市作为一种空间形态所具有的意义和影响。这提醒我们不能只看到超大城市的现状和其内部存在的具体问题，还要关注超大城市这种空间形态本身的诞生及其形成过程中的动力机制。另外，对超大城市的认识与治理，也需要一个关于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超大城市；空间；现代性；大卫·哈维

按照国际标准和中国的最新规定，人口1 000万以上的城市被称为超大城市(国务院,2014)。因为规模庞大、构成复杂，超大城市治理成为一个世界级难题。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的浪潮中，中国大城市的规模也在较短的时间内经历了快速的膨胀。目前，我国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已达142个，其中1 0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有6个，而全世界千万人口级别的超大城市才共有25个(中新网,2014)。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上海等中国城市要进行社会治理创新，探索超大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模式(陆文军等,2017)。大卫·哈维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一书，将地理学的空间视角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对巴黎19世纪后半期的规模扩张和现代转型进行了深入剖析，对于我们在理论上认识超大城市的本质特征和在实践中开展超大城市的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巴黎是法国首都，法国最大的城市、欧洲第二大城市，是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中心，与纽约、伦敦、东京和香港并列为世界五大国际大都市。“大巴黎”地区的人口超过千万，几乎是法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新华网,2008)。在法国、欧洲乃至全世界，巴黎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影响，是超大城市的一个典型代表。1853年开始主政巴黎的奥斯曼在巴黎城市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借助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行政权力，并在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裹挟下对巴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哈维称之为“创造性破

作者简介：程士强，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社会学、组织社会学。

坏”(哈维,2010:2)。正是这次改造迫使巴黎这个古都走进现代,造就了现代巴黎,但也令其在剧烈的时空变迁中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一、新巴黎：资本、权力与现代性的时空汇聚

巴黎不仅是超大城市形成与变迁的一个典型样本,更是一部浓缩的西方文明史。对于巴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结构复杂的大都市来说,其城市变迁过程必然汇集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力量的演化与博弈。如何把握这种复杂的城市史?如何探究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如何理解大规模城市变迁的意义与局限?传统的城市研究关注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特征、产业结构、人际关系和群体特征,但哈维(2010:20-22)认为:“我们有丰富的理论来处理城市‘当中’发生的事,唯独缺乏的是城市‘本身’的理论;至于现有的城市理论,通常看起来面向太单一也太僵硬,完全无法表现出都市经验的丰富与多样。”哈维采取了一种空间取向的新马克思主义视角,对巴黎的空间重组过程进行了宏大而有包容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在哈维看来,巴黎是个“巨型万花筒”,但他并不想简单呈现巴黎的复杂多变,而是要从这个万花筒中看到“巴黎如何形成以及巴黎如何成为孕育现代性的中心地”。

现代性如何兴起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它的意义超越城市,又寓于城市变迁中。通过对巴黎这个现代性之都形成过程的回溯,哈维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中强调了第二帝国的国家权力运作和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扩张两大动力机制,而后者又起到最终的支配作用。奥斯曼作为拿破仑三世的亲信,是帝国权力的代言人,他想“将巴黎打造成法国的现代之都,也许还能成为西方文明的现代之都,然而最后他只成功地让巴黎成为资本流通掌控一切的城市”(哈维,2010:123)。

1853年6月,奥斯曼受命改造巴黎。他有计划、成体系地对巴黎的社会与经济生活的空间架构进行重整,范围包括新的道路网、下水道、公园、纪念碑和象征空间、学校、交通、官署、住房、商业建筑等。奥斯曼偏好直线逻辑、坚持对称与均衡、重视整体视角。他希望能有一个通盘的计划,合理而有秩序地调和多种多样的环境。他认为都市空间应被视为一个整体,城市各个分区与不同功能应互相支持以形成一个整体。都市空间整体的关怀,引领奥斯曼致力于将市郊合并为巴黎的一部分。这种对崭新而扩大的空间的追求以及奥斯曼“不做小计划”的行事风格,是促进巴黎空间规模扩张并形成今天的“大巴黎”的一个重要原因。哈维认为,各种理性化的城市规划思想与实践早已有之,之所以奥斯曼能被视为现代主义都市计划肇始者,乃是因其计划规模本身的宏大以及计划与概念的全面性(哈维,2010:120-122)。

规模宏大是这一时期巴黎城市化进程不同于以往的一个显著特色,这不仅是奥斯曼和拿破仑三世的个人偏好,更是为了满足当时第二帝国的政治需要:以拿破仑事迹为中心的民粹主义以及帝国权力的展现。奥斯曼的使命之一,便是让巴黎披上罗马帝国的外衣,使其成为欧洲文明的领导者与核心。巴黎重建中出现的纪念性建筑在空间与视野设计上集中于帝国权力的象征,有助于支持新政权的正当性。在盛大的庆祝仪式中,“慕名而来的民众莫不赞叹帝国的风华、优雅与权力”(哈维,2010:120-122)。

奥斯曼还希望将“危险阶级”和有害的住房及工业从市中心驱逐出去,以使得巴黎能够摆脱工业基础与工人阶级,如此巴黎或许能变成支持资产阶级秩序的非革命堡垒。到了1870年,巴黎市中心绝大部分区域都已经看不到工厂,大部分工人阶级也被迫搬离市中心。市中心留给彰显帝国权力的纪念碑与官署、金融与商业以及急速增长旅游服务业(哈维,2010:160)。新的道路系统整齐地环绕在传统发生革命动

乱的中心周围,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快速调派维持秩序的部队前来(哈维,2010:122)。然而流离失所的人口从市中心往外围分散,使得新市郊充斥着闲杂人等,并让当地成为下层工人阶级的专属居住区,阶级斗争的策略与地理分布因此出现剧烈变化和新的风险(哈维,2010:159)。

但是,不管奥斯曼与拿破仑三世有什么目的,他们的努力最明显的效果就是改善了巴黎市内货物与人员的流通。城市重建计划必然受制于由资本累积来获利的逻辑,举例来说,将新的铁路网的中心设于巴黎,表面上看是为了政治与战略的原因,实际上完全是为了经济需要,经济的群聚效果为巴黎吸收了新的投资和新形式的经济活动。奥斯曼相当了解自己的角色限制,他知道必须动员的力量就是资本的流通,但到最后这股力量反过来支配了他。用来改造巴黎内部空间的公共工程可以吸收过剩的资本和劳动力,通过建造特定的空间配置,可以促进资本的自由流通。脱离了封建束缚之后,资本便可以按照自己独特的原则重新组织巴黎的内部空间(哈维,2010:120-123)。

巴黎内部空间的剧烈转变不是因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而起,他们只是响应了正在进行的过程和需求。在经历了一段惊人的工业增长后,到了1850年,巴黎似乎受困于两大问题的束缚。首先,巴黎受到广泛且深刻的资本危机的影响,这是资本主义在完全发展之后过度积累所造成的危机,资本与劳动出现巨量剩余。其次,巴黎古老的都市基础设施无法满足苛刻的资本积累的新条件。因此,1850年的巴黎因为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以及伴随而来的各种可能而骚动不已。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民粹主义者拿破仑三世得以上台,但他也必须面对各种复杂的问题,必须适应急剧发展和索取无度的资本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拿破仑三世与他的幕僚试图将巴黎从牢不可破的古代束缚中解放出来(哈维,2010:103-109)。对于拿破仑三世的上台、第二帝国的成立以及之后的巴黎公社运动,马克思等学者有过经典的论述(马克思,2009a),哈维也在本文中给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思路。

上述巴黎现象背后的规律是资本增长必然面临过度积累的危机和需要通过空间生产来缓解与转移危机。哈维承继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将城市形态及城市空间生产放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背景中,系统地使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范式,从深层的经济领域和资本逻辑入手揭示城市空间的动力机制、城市的本质及城市化的根源(董慧,2010)。哈维(2016:246-261)认为,资本总是追求无止境的复合增长,但最终消费和资本实现会遇到极限,从而出现资本过剩和贬值的问题。资本如何应对这种危机?这涉及哈维提出的“时空修复”和“时空压缩”概念。所谓时空修复就是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来缓解资本危机的方法,时间上资本可以投资一些长期性项目,空间上资本可以从物质商品生产转向空间生产并不断地拓展新的空间。通过持续的空间生产,比如城市建设、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资本积累的新市场和新地域的开拓,为吸收资本过剩和劳动过剩提供了重要的途径(赵海月、赫曦滢,2012)。

空间是资本得以再生产的场所、对象与产品,但时空的有限性对资本也是一种限制。所以,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另一个办法是“时空压缩”,从而为资本自由流通进一步扫除时空障碍,一般表现为交通与通信方式的改善、市场的扩张与一体化等。也就是马克思(2009b:169)所说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即“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城市承受了资本过度积累导致的矛盾,“时空修复”和“时空压缩”又进一步加剧了城市的资本化和空间的商品化。巴黎的空间改造与规模扩张、现代性转型,乃至政治权力演变,背后的根本动

力都是资本面临的这种矛盾和突破矛盾无限扩张的逐利冲动。在哈维看来,城市化就是资本的过程,是无情与贪婪的资本控制下人造的空间不断建立与转换的过程。城市这个被创造出来的空间形式,只不过是加速资本的循环以获取更多剩余价值服务的(董慧,2010)。

正是在资本积累面临亟待解决的矛盾这一大背景下,第二帝国委托奥斯曼开启了巴黎的空间改造工程。当时的政府秉承一种“国家生产性支出”的理念,即国家出资的公共工程原则上可以协助吸收剩余的资本与劳动力,在不额外增加税率的情况下维持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哈维,2010:152)。当然,巴黎空间的改造和现代化转型仅凭政府出资是远远不够的,新的空间关系乃是从国家、金融资本和土地利益的结盟中创造出来的(哈维,2010:113)。政府试图以直接干预、大量信贷,以及改革金融结构等混合做法来促使过剩的资本和劳动力转化为有形的新基础建设,成为经济复苏的动力。如果金融机构不变革,则巴黎的改造不可能按照预定的步调进行。不仅是因为巴黎的经济运转需要贷款,也因为奥斯曼的计划所开启的空间需要金融力量去开发、建设、占有以及经营(哈维,2010:128-130)。

新的金融力量以投机的形式塑造了巴黎及其都市形式,其具体的工具是“资本联合”,也就是将涓涓细流的小额资本汇聚成庞大的资本流通,如此才能以必要的规模执行计划。“不筹募投机资本,便不可能有现代性。”当时的金融界善于整合上下游金融体系,因此从事庞大的投机事业,包括投资铁路建设以及各项运输、工商业等新建项目,并且在现有的城市环境里进行大量投资。信贷体系的变革也造成空间关系的变革。在巴黎,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中介机制是金融资本与土地财产的整合——房地产。“巴黎的房地产越来越被视为是一种纯粹的金融资产,一种虚拟的资本形式,它的交换价值被整合到一般的资本流通当中,完全支配了使用价值。”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重组走的是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路线,它逐渐通过不同使用者以竞价取得空间控制的方式来进行巴黎内部空间的组织,土地和房地产的租金和价格在特定的资本逻辑下逐渐发挥土地使用配置的功能。在此背景下,巴黎空间规模的扩大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资本的流通已经完全释放到重建既有环境及空间排列的任务之中。(哈维,2010:128-150)

资本与权力联手打造了一个新巴黎,哈维称之为“现代性之都”。那么,何为“现代性”?透过新巴黎的诞生过程,哈维指出现代性的核心是“创造性破坏”——它将世界视为白板,一个可以任意切割、刻画的空间,并且在完全不指涉过去的状况下,将新事物铭刻在上面。如果在铭刻的过程中,发现过去横阻其间,便将过去的一切予以抹灭(哈维,2010:1)。资本和权力各有其不同的追求,但当它们作为一种推动现代性的力量时,就会有一个共同的运行逻辑,那就是这里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哈维对这种现代性的逻辑持一种质疑和反思的态度,称之为“现代性的神话”(哈维,2010:1)。很多证据表明与过去的决裂是不可能的事,这是现代性值得质疑之处。但“神话”的力量不容小觑,决裂本身带有的说服力与颠覆性正是值得反思的,后文会谈到这种创造性破坏所导致的社会后果。

从工业革命到法国大革命,法国和巴黎的现代化进程早已开始,19世纪后半期的奥斯曼和当时的资本力量对巴黎的改造并不是同过去的“决裂”,而是在延续一个已经开始的进程。但之所以这个时期的改造标志着“现代性之都”的诞生,关键在于其“规模”:奥斯曼和资本主义都以前所未见的庞大规模来进行创造性破坏,催生了一种新的空间形态——超大城市。在七月王朝时期就有一个改造巴黎的计划,但奥斯曼改变了思想与行动的空间规模,他将计划的规模扩大到原来的三倍。奥斯曼主政时期创造的新空间与19世纪前期的形式、材料都一样,但在规模上却有巨大的变化。奥斯曼秉承的与过去全面决裂的现代性神话固然值得我们质疑,但必须承认的是,在新科技与新组织形式的推动下,他所协助建造的规模的确有剧烈的

变化(哈维,2010:11-15)。

规模问题不仅奥斯曼关心,金融家与资产阶级也相当关注,因为这涉及资本的自由流通和过剩资本的出路问题。“资本主义对于建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改变了计划的规模”(哈维,2010:14)。运输和通信的改善产生了“时空压缩”的效果,行车时间缩短,人员、商品和观念所能移动的空间距离扩展。奥斯曼必须从更大的规模思索并策划都市进程,金融家、商人和实业家也必须调整自己的思维并找到新的组织方式,以在更大的地理规模上进行运作(哈维,2010:124-125)。奥斯曼旨在彰显帝国的无上权威与正当性,资本则需要自由流通和充分释放,权力和资本打造的这个“现代性之都”在空间规模上表现为超大城市。大规模、一体化、整体性,既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是现代性的一种特征。如果说现代性是一个神话,那么超大城市就是这个神话的空间展现,即图腾。

二、超大城市的四维空间

作为一个超大城市的巴黎,其特征并不仅仅体现在占地面积大和人口数量多,而是一个“社会综合空间的存在形态”(唐晓峰,2010)。在哈维、列斐伏尔等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那里,空间早已不单是一个地理/物理概念,也不仅是城市和现代性存在的场所。甚至可以说,城市空间就是城市本身,也构成了现代性的一个核心属性。所谓的城市性或城市的本质,除了可以从人口密度大、非农产业集聚、社会交往陌生化等传统角度理解外,也需要纳入这种空间的视角,即城市本质上是因为资本和权力在特定空间的展现和再生产而形成的一种空间形态。结合哈维的空间概念和他在本书中对巴黎的分析,如果说超大城市是一种空间形态,那么它具体包括地理空间、心理—观念空间、社会交往空间、交通与通信空间四个维度。地理空间关注一个城市的面积、方位和内部的区位分布结构;心理—观念空间关注一个城市及其不同位置的人所拥有的观念、意识形态,尤其是他们对城市地理空间的认知与想象;社会交往空间关注城市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地理分布特征;交通与通信空间关注交通、通信的技术发展与网络结构,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员、信息、商品、资本流通的时空特征。

(一)地理空间

哈维特别强调空间的关系性,认为空间是一种对象之间的关系,只有对象存在且彼此联系的时候才存在空间(强乃社,2012)。这种关系性在空间的四个维度中都有所体现,其在地理空间中表现在不同的人群、产业、建筑、景观、财富等在城市中的区位分布、相互之间的距离、关系状况以及各部分相对于其他部分的特征。无论空间概念的内涵如何丰富,地理空间都永远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地理空间作为城市空间的物质基础,表现为城市的规模、内部各部分的区位分布以及各地区景观特色。作为一个超大城市的巴黎,于19世纪后半期逐渐在这些方面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征。

前文提到,19世纪后半期的巴黎在空间规模上的急剧扩张,是其区别于该市以往发展历程的一个鲜明特点。不论背后的动力是权力还是资本,都表现为一种宏大、整体、理性化的现代性想象。随着部分功能与人群的外移以及郊区的并入,巴黎的占地面积和人口规模都在较短的时间内膨胀起来。以人口为例,巴黎人口从1831年的78.6万,增加到1876年的近200万(哈维,2010:103-105)。除了规模以外,巴黎的空间布局结构及其规律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巴黎的空间关系被重塑,原来分散的、多样化的地方共同体被纳入到同一个整体中,被重新切割(哈维,2010:126)。这背后既有奥斯曼的规划这只“看得见的手”,又有资

本这只“看不见的手”。奥斯曼有意识地将工业和工人阶级迁到郊外,并修筑笔直宽阔的大道,将能体现商业繁华与帝国荣光的建筑布置在市区大道两侧,以重整原来的街区构成和景观特色。但问题出在奥斯曼在几何学上对直线的依赖,造成了单调、同构性和乏味。巴黎的多样化完全被抹杀,代之以单一化的城市面貌。时人批评说:“巴黎只有一条街道——里沃利街,而这条街被复制于各处”(哈维,2010:278)。

不管奥斯曼看上去给巴黎的地理空间带来了怎样的巨变,其实,土地和房地产的租金与价格在特定的资本主义逻辑下发挥着更根本的配置功能。曾经影响巴黎空间布局的各种复杂模式被熨平,代之以较有系统的土地价值地图。地价明显从市中心往市区周边层层下降,并且可以清楚区分出资产阶级所居住的西区与工人阶级的东区,两者之间刚好隔着高租金的商业中心,同时也显现了右岸的朝气蓬勃和左岸的死气沉沉。工业、商业、政府与住宅使用彼此竞争,不同种类的工业之间以及不同档次的住宅之间也按照这种资本主义的逻辑进行竞争(哈维,2010:147-148)。

奥斯曼的改造工程以及房地产市场所产生的地价效应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空间区隔。市中心在重建之后出现了“士绅化”现象,尤其是西区形成了专属于资产阶级居住的区域,贫民窟的拆除与房地产的投机事业巩固了资产阶级在西区的势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部与东部的周边地区成为了专供下层阶级居住的低收入住宅区,如贝尔维尔、维雷特与蒙马特,这些地区的居民在往后的巴黎公社暴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哈维,2010:149,254)。甚至可以说,巴黎成为一座被区隔成两个阶级与两个空间的城市,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地方曾经堆过街垒,城市的哪个部分属于“另一边”。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作为“他者”的“另一个巴黎”被看成危险阶级,他们的贫困有时会激发人们的怜悯,但绝大多数时间还是令人感到恐怖与厌恶(哈维,2010:296-297)。

(二)心理—观念空间

空间并不是一个抽象和先验的存在,它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从巴黎的案例可以看出,这种实践活动主要是围绕资本和权力展开。任何的人类实践活动都会受到观念的引导,也会产生有各种各样的心理感受。所以,地理空间中会打下观念的烙印,地理空间中的人群所拥有的各种观念、意识形态、感受与想象也会形成一个“观念之网”,构成了笼罩在地理空间之中的“心理—观念空间”。

奥斯曼对巴黎的空间改造有深刻的思想背景,从艺术界、文学界到思想界,都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以1848年为界,之前有古典主义画派,之后则是现实主义;1848年之前有浪漫主义诗人和小说家,之后则是严谨、精简而洗练的散文与诗;1848年之前盛行的是乌托邦主义与浪漫主义,之后则是管理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哈维,2010:2)。可以说,1848年之后,社会主义变得更“科学”,资产阶级思想则变得更实证主义、更具管理性格且更为冷酷。当然,对奥斯曼影响最直接的是后者,他对“第二帝国巴黎的重新型塑,背后仰赖的是资本主义对于巴黎是什么与巴黎会是什么的再想象”(哈维,2010:68)。

资本主义对巴黎的想象究竟如何?资本希望“让巴黎失去图像……然后再大规模生产自己的图像以取代原先资本所摧毁之物”(哈维,2010:68),这是一种将巴黎视为均质整体并按照商品化原则进行再切割的想象。在作家左拉的小说《猎物》中,巴黎成了一个等待切割的“猎物”:一个大投机者想象“巴黎二十区下起了黄金雨”,“如何融掉这几个区”,“干燥而兴奋的手不断在空间中切割”,“它毫不费力地将巨大的巴黎大卸八块”。左拉因此借这个投机者的视角从高处和从整体的角度重现了巴黎的创造性毁灭(哈维,2010:125-126)。野心勃勃的投机者捕捉了整体,将巴黎切割,秉承同样观念的奥斯曼也对巴黎进行了整体空间的规划与切割。奥斯曼推崇的建筑形式和空间结构表现出“商业都市主义的新概念”,即在都市里

规划出完整的区块,使其具有单一功能,这让城市出现全新的风貌(哈维,2010:112)。

奥斯曼还以“卫生科学”与“外科医学”的视角对巴黎进行拆除、清理和重建,他以不带感情的方式将巴黎看成是一座人造物,并且认为必须从机械、自然科学原理与技术角度来理解巴黎。“用来对巴黎进行三角测量的高塔,象征着以巴黎为整体的新空间视角,如同奥斯曼对直线几何学与精准测量的强调。”经过这样的创造性破坏,哀悼之声随之而起,并且通常伴随着一股怀旧之情。人们经常想起旧巴黎被破坏而感叹往日记忆的烟消云散——“我们遗留给后代子孙的是堂皇而难以忍受的新住宅、富裕的群众、令人难以忍受的庸俗、令人惊骇的唯物主义,不禁为老巴黎,伏尔泰、狄德罗与德穆兰的巴黎,1830与1848年的巴黎留下大量的眼泪。”(哈维,2010:275-278)

创造性破坏不仅带来了一股多愁善感的怀旧情结,也改变了巴黎人的空间想象。交通通信技术的进步、资本流通的加速、国际劳动分工不断增强的竞争与依赖,使巴黎从地方束缚中解放,但也使其更容易受到远方事件的伤害。人们无需离开巴黎,便能体验空间关系转变的震撼。内心的地理世界因此必须调试并且学会欣赏构成全球政治经济活动空间的地理变动与“他者”世界。当然,“他者”不仅来自远方,也存在于巴黎市内。资产阶级例行性地将生活在贝尔维尔“边界”上的工人描绘成野蛮人。而革命分子则将形象反转过来,他们认为工人高贵、技术熟练、自食其力、聪明、慷慨并且有领导能力。在他们眼中,另一边的巴黎西半部,居住着投机者、股市贪婪者、食租阶层与放高利贷者,他们榨取工人的血汗并且摧毁他们的尊严(哈维,2010:287-299)。

(三) 社会交往空间

如果说空间本质上是对象之间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首先就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就是“社会空间”,并且在地理分布上形成相应的特征。长久以来,巴黎一直被分割成各个区块与都市聚落,每个地区各有其特定的人口特性、经济活动性质乃至生活风格,具有清晰的地方共同体意识。邻里酒馆是促进当地形成连带关系的重要场所,外来移民进入巴黎后通常会依据原籍或行业在市内形成各自的“收容区”,“流浪者”则会运用自己的亲族网络在巴黎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找到出路。然而,19世纪后期,奥斯曼的改造工程、土地投机以及帝国统治瓦解了共同体意识,用一种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摧毁了地方共同体的藩篱(哈维,2010:248-249)。

对地方共同体的破除并不是想使众人成为孤立的个体,而是要用一种更大的整体性的视角来建立一种普遍的、抽象化的社会关系形式。奥斯曼一方面拒绝某种共同体形式,另一方面致力于灌输另一种共同体形式。新的共同体既是一种“金钱共同体”,又是建立在帝国荣光基础之上的国家共同体,总之是一种与专制统治、自由市场主义及新国际秩序兼容的共同体意识。奥斯曼试图推销的是一个新颖而现代的共同体概念,金钱力量将在当中被赞颂为“华丽大道上、百货公司里、咖啡馆中”商品拜物教的盛大庆典,金钱共同体瓦解了所有社会连带的纽带关系。奥斯曼以新颖而更加雄伟的尺度来构思都市化,他消除了一些共同体,但也打破了共同体之间的藩篱,联结了原本孤立的共同体,并让各共同体在都市母体中各自发展出专业化的角色(哈维,2010:247-249)。

经过这种整体性视角下的创造性破坏,巴黎日益成为一个被金钱关系联结起来的整体,也被放到了一个更大的整体之中。空间藩篱的撤除开放了巴黎市场,使外省与外国能在此竞争。这也意味着巴黎的产业可以取得各地的原料与粮食,以满足它的劳工并降低成本。由于巴黎市场有强大的产业基础,巴黎可以轻易到外省及海外进行竞争,如同外省与外国到巴黎来竞争一样。不过,巴黎在新国际分工上所占有

势也带来恶果,使巴黎产业越来越暴露在外国市场的变化无常之中。在这样一个一体化乃至全球化的市场体系中,巴黎的商人打破了原来的手工业传统,重新组织巴黎产业以,建立了一个新的外包网络。在竞争逐利的压力下,巴黎商人利用各种供给来源,并将指挥与外包的网络延伸到巴黎以外地区。商人阶级与新金融力量的兴起,将巴黎产业编进复杂的控制之网中,商人对于获利的关心以及他们营运的地理范围,使他们采取重构巴黎产业以适应国际分工的需要。小规模的生产者,比如原来骄傲而独立的手工工人与手工业主,逐渐被困在贷款与债务以及特定的指挥与外包控制的网络中,在整个体系中被迫沦为只做单一细小环节的劳工。在这样一个体系里,劳动是去技术化和被控制的(哈维,2010:171-176)。

在此之前的半个世纪,手工工人有一套非正式的控制劳动市场的手段和自我保护体系。他们组成法人形式的组织,集体与雇主协商工资和工作条件。劳动市场通常采取集中化的做法,并受集体控制,雇主从工人集中地或特定的场所雇佣工人,而工人在这些地方也能交换信息、对雇主施压。19世纪后期,手工工人对劳动市场的控制日减式微,巴黎劳动市场在规模上的爆炸性发展与空间上的逐渐分散,也使传统劳动市场控制机制趋于瓦解,地理零碎化使原来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工人与雇主分割两地,加速了师徒制的崩坏,非正式的劳动市场控制体系难以维持。与此同时,通过越来越细分的零件与社会分工,劳动被去技术化,手工技术不是被剔除,就是在精细的劳动分工中被专业化的技术所取代,工人的社会地位和组织能力大幅度下降(哈维,2010:148-191)。

奥斯曼的城市改造项目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导致了巴黎的居住隔离,从而恶化了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以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在环境的逼迫下,工人不得不搬出巴黎市中心,这对工人的行为与道德产生不幸的影响。过去这些工人住在比较高的公寓楼层,至于比较低的楼层则住着商人以及其他收入优渥的家庭。同一栋公寓的住户之间往往培养出休戚与共的连带关系。当工人生病或失业时可以得到邻居的帮助,人性尊严使得工人阶级养成谨守规范的习惯。之后工人被迫搬迁到圣马丁运河乃至城门以北地区,他们住的地方没有资产阶级家庭,表面上摆脱了昔日邻居的控制,实际上却是断绝了接受资助的机会。”(哈维,2010:250)工人阶级缺乏体面的房子与适当的烹饪设备,不能拥有稳定的家庭生活所需的设备与舒适,最后势必走上街头与广场,他们将大量的闲暇时间用在当地的咖啡馆与酒馆,这里成为工人阶级社会交往的场所,也成了人们批评社会秩序以计划重组社会秩序的场所(哈维,2010:213)。

巴黎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业空间、公共空间以及通过消费所造成的私人占有公共空间的现象,三者所形成的共生关系越来越关键。商品景观逐渐跨界支配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并且有效地将两者合二为一。大型百货公司与高档咖啡馆出现在新建大道两旁,使私人财富展示于公众面前。群众的社交活动因此转移到大道上,并且受到商业法则与警察力量的控制。公共与私人空间之间的边界充满了孔隙,新大道作为公共空间,却需要通过商业与私人活动使其得以展示并增添光彩,实际上形成公共空间的私人占有。比如高档咖啡馆,只有经过选取,为了商业与消费目的的公众才能进入,贫穷的家庭则将这种咖啡馆看作是一个排他空间。另一方面,私人空间的私密性却越来越难以保障,对于女性来说,逛街、看橱窗、购物以及在公共空间展示她们的战利品而非将其储藏在家中与闺房之内,乃是出于时尚的必要。女性自身甚至也成为景观的一部分,成了商品与商业的展览场(哈维,2010:222-232)。总之,外部空间成了内部空间,内部空间也不得不向外部开放(哈维,2010:292)。

第二帝国初期极为强调能体现帝国威仪的“帝国景观”,但随着时光流逝,“商品景观”逐渐占据了上

风,成为“商品拜物教的朝圣之地”。帝国景观在许多方面与商品化及资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深化的流通力量完全吻合。新大道不仅创造了就业,也促进了商品、金钱与人潮的流通(哈维,2010:234、222)。景观的商品化表明了商业逻辑对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支配,商品拜物教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与商品化。

大众消费主义的浪潮虽然波及甚广,但旧有的区隔仍然存在:“托尔托尼咖啡馆与意大利大道主要仍聚集着上层资产阶级,神庙大道则是焦虑的中产阶级,另一方面,广大消费主义则在同时间于各处增生”。其实,阶级区分比以往更加明显,大道沿线成为展示资产阶级财富、铺张浪费与女性时尚的空间。广大的工人群众必须在别处生活消费,工人阶级的咖啡馆或酒馆成为了他们的公共空间。工人阶级的连带关系是借由咖啡馆或酒馆为中心而以邻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因为住宅的缺乏与狭窄,使得街道与咖啡馆在工人阶级区成为社交中心。但这些地区昏暗肮脏的私人与商业空间,让公共空间蒙上一层阴影,无产阶级街头生活的混杂骚乱,让居住于安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感到畏惧,大多数资产阶级坚决避开这些地方(哈维,2010:229-234)。

(四)交通与通信空间

交通与通从网络会构成一个资本、信息、人员流通于其间的空间,交通与通信条件会对流通的速度、距离和规模产生重大影响。^①哈维说:“通过运输和通信对空间进行真正的组织,是所有历史和地理分析必须捕捉的首要的物质事实。”(哈维,2010:126)像巴黎这样的超大城市,往往是在交通与通信网络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节点,其内部的交通与通信系统同样也错综复杂,并对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观念空间产生十分关键的影响。

交通和通信设施的建设是空间生产的一个重要形式,它可以作为大规模的长期投资而吸收过剩的资本和劳动力,从而转移和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第二帝国在这方面的成果相当辉煌,法国的铁路网从1850年的少数几条路线(1 931公里)扩展成1870年长达17 400公里的复杂网络,交通运量与工业产出同时扩大为原来的两倍。在1856年还没有电报系统,但十年后却已铺设了2.3万公里。电报促进市场与金融决策的协调,人们可以不断获知巴黎、里昂、马赛和波尔多等地的商品价格,之后,连伦敦、柏林、马德里和波尔多等地的商品信息也能及时披露。运输和通信系统,作为新世界市场和新国际分工的基础,在1850年到1870年间广泛地建设完成(哈维,2010:118-119)。

新运输系统的投资方针,是朝着行政、金融、经济和人口往巴黎集中的方向进行的。受此影响,巴黎工业的投入成本变得比较便宜,货物出入工厂和城市的频率、数量和速度都增加,不仅降低了资本周转率,也开启大企业在生产与分配两方面营运的可能,由此导致零售业革命和大型百货公司的出现。移动的不只是货物,世界各地的游客涌入巴黎,郊区的商家也往巴黎集中,巴黎劳动市场则将触角伸展到更远的地区以满足快速增加的劳动力需求。外在空间关系的转变,迫使巴黎必须加紧让自身的内部空间更加合理。奥斯曼对巴黎道路网的建设改善了巴黎市内货物与人员的流通量。新旧火车站之间、市中心与市郊之间、左岸与右岸之间、进出中央市场、来去于各娱乐场所、工业区与商业区之间的流动,因为长达90英里宽阔大道的建成而变得十分迅速,也大幅度降低了移动的成本、时间与拥堵程度(哈维,2010:120-123)。正是因为交通与通信网络缩短了时间和距离,超大城市这种空间形态才得以成为可能。

猛烈的时空压缩之后,时空的矛盾效果也开始在各地出现。面对行车时间缩短的世界,空间关系被急

^① 在当下,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作用更加明显。

剧压缩,巴黎人也因此感到手足无措。运输和通信方面获得了改善,然而交通拥挤的状况并没有缓解多少。1855年到1860年间搭乘公共马车的乘客人数增加到原来的三倍,火车车厢也是相当拥挤。过度拥挤产生压迫感,人们必须不断地在个人隐私和公共空间之间取得平衡。火车车厢按照阶级来划分,公交车则以“上层或里层”来做分野。然而不管是哪一种车厢,只要遇到拥挤状况就很难维持个人的隐私及私密。交通与通信系统使市郊以及更远的农村地带也都卷入巴黎生活的混乱当中,这表示在大规模城市化的进程中,人们无处可逃(哈维,2010:123-125)。

铁路网的延伸,以及海上航线与电报连接的日渐加快,动摇了人们原本的时空视野(哈维,2010:287)。新的交通与通信空间给巴黎带来了大量的外来资本与游客,也使得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方便。因此,巴黎人不得不近距离面对各种各样的“他者”。奥斯曼的大道“无意间打开了自我封闭且深奥传统的都市贫民世界,并且发现以往的神秘原来是一片悲惨”。资产阶级并不喜欢遇到“他者”,如工人阶级或危险阶级(哈维,2010:292-293)。另外,新的空间关系对地方共同体的生存与意义构成挑战,甚至连巴黎内部的地方共同体也深感威胁,因此导致了地方认同力量的反弹。在这里,我们看到普世资本主义文化及其空间关系,与传统的土地忠诚及认同之间的矛盾(哈维,2010:123-124)。

三、空间重组的社会后果

超大城市的形成,实现了城市空间的更新、扩展与整合,创造了巨大的经济财富,汇聚了大量的人流、商品流、资金流,资本过度积累导致的过剩危机得到转移与缓解。但是,从巴黎的情况看,资本固有的矛盾不可能通过空间生产与时空修复而得到根本的解决,最终只会导致危机在更大范围内的爆发;对原有空间格局与社会支持系统的创造性破坏,也激化了社会矛盾,甚至导致了巴黎公社运动的爆发。

从物质生产转向空间生产,比如通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景观营造、交通与通信设施投资等方式,的确可以暂时转移无限逐利的资本所导致的过剩危机,而且还可以因空间条件的改善而降低资本流通所需的成本和时间。公共资产的私有化、新市场的创建,可以扩大资本自由运作的空间,使资本得以进入之前无法进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领域。但是,这些额外的市场机会并不足以完全消化资本的复合增长导致的过度积累,等到一切都商品化和货币化时,这种扩张过程便遇到无法超越的极限(哈维,2016:260-261)。而且,那些一度富有活力的资本积累新空间最终会产生新的剩余,从而需要借助进一步的地域扩张来吸收。对于特定的空间来说,资本创造出符合它某一时期需求的地理景观,到了下一个年代却变成了资本积累的束缚,这个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资本只有两个选择:出走,任由遭离弃的地方破败和贬值;又或者留在原地,无可避免地产生资本过剩,最后这些资本因为找不到有利可图的出路而泛滥成灾。一般来说,资本会选择前者,也就是为了促进资本的进一步扩张,资本必须破坏它之前创造出来的旧景观,因此资本就对所在土地释放出“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某些群体受惠于这当中的“创造”,另一些群体成为当中“破坏”的受害者。至于何者受惠、何者受损,则总是涉及阶级不平等的问题(哈维,2016:158-168)。

城市空间的生产 and 改造是在帮助资本尽可能形成剩余、完成积累,这种剩余还必须通过再投资的方式得到消化,否则,一个不能持续积累的资本体系就会出现危机。当然,这种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变数(强乃社,2012)。“新一轮的时空压缩充满着危险,跟它所提供的在特定场所生存的可能性和解决过

度积累的问题的可能性一样多。”它对空间危机的暂时缓解不仅不能彻底解决危机,反而为酝酿更大的危机创造了新的条件,资本主义因此日益逼近自己的空间极限(高玉林,2015)。不计后果地促进增长加速以及随之而来的贬值将变得越来越难控制,资本的种种矛盾不再像以前某些时候那样彼此约束、避免失控,而是很可能将在必须维持复合增长的压力下,彼此感染,失控爆发(哈维,2016:270)。

在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通过交通设施和城市公共项目建设吸收过剩资本与劳动力的做法很快就遭遇瓶颈(哈维,2010:119)。支持这些公共项目的是前文提到的“国家生产性支出”,它需要债务融资的方式来支持。从1853年到1870年间,巴黎市政府的债务从1.63亿法郎增加到25亿法郎,1870年,债务负担已占了市政预算的44.1%。市政府财务因此变得极为脆弱,无法承受带息资本流通所造成的任何波动、困难与不确定。另一方面,生产性支出似乎需要永不停止的工作循环,它将沉重的债务负担加诸在未来的生产上,使大多数人口必须维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且被迫永无休止地工作。“增长的机器”一旦启动,就不能停止。如果公共工程停顿,就会造成税收减少与建筑工人失业,问题将十分严重(哈维,2010:152-155)。

通过重建巴黎来吸收过剩的劳动力与资本,产生了各种负面效果,例如流离失所的人口与空间区域的增加、距离工作地点太远、高租金以及过度拥挤。在这个过程中,日益资本化的土地与房地产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市场投机的浪潮中也出现了建筑过剩的现象,不过是出在高档住宅领域。1860年代,高收入住宅需求就达到饱和。中低收入住宅供应完全被排除在奥斯曼的城市改造计划以及主流的房地产开发体系之外,而由另一个完全不同性质的土地和住宅开发体系来处理。这个体系主要由小地主负责开发,很多资金微薄者(律师、商人、手工业者、甚至普通工人)也参与了这个住宅市场的投机。无论是大开发商还是小开发商,他们逐渐都倾向于从增值的土地与房地产中牟利,巴黎的土地和房地产按照资本的逻辑来进行土地使用配置。资本的逻辑按照使用者以竞价取得空间控制的方式产生了空间区隔现象,将巴黎分成两种开发与建设类型,产生了一个二元而阶级导向的住宅供应体系(哈维,2010:146-150)。

“房子是用来住的”,所以,住宅的本质应该在于其使用价值,但是,资本化的房地产市场片面追逐交换价值,使得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在建筑量快速增加的大背景下,面向中低收入者的住宅供应却严重不足,工人阶级的住房状况严重恶化。当然,在巴黎周边,也产生了小规模投机建筑体系,以满足工人阶级的住宅需求。但是,巴黎周边住宅的投机使得当地租金不如想象中的便宜,尤其是市郊的建筑商与房地产业者也强烈倾向于从巴黎房地产繁荣中分一杯羹,于是他们便努力从工人身上赚取利润。在最糟的情况下,土地与建筑都很昂贵,地主毫不客气地攫取8%或更多的利润。对于那些分享了第二帝国经济利益的人来说,上涨的租金根本不成问题。但对于靠出卖劳动维持生活的工人来说,则就另当别论了。快速上涨的租金使工人的生活负担加重,但住宅条件又差得触目惊心。如此绝望的住宅环境势必产生一些社会效应,空间的缺乏迫使大部分的社会生活转移到大街上,没有适当的烹饪设备使人们不得不流入到当地的小咖啡馆与饭馆,结果,这些地方成了集体政治骚动与意识形成的中心(哈维,2010:208-211)。

底层民众的生活困难还不仅住房一项。新的金融体系将无数小储蓄人的资金汇集起来加入到投机的浪潮中,这些人过去一直没有投资机会,从而产生了一种“金钱民主化”的效果。但是,所有储蓄金都被吸收到一个集中而等级化的组织体系中,底层人更容易受到金融风险的伤害,而资金却主要用于满足富裕阶

级或大商人的住宅及商业建筑的需求(哈维,2010:129、134、144)。撤除空间藩篱后导致的“时空压缩”效应使巴黎在新国际分工中占据优势地位,但也让巴黎产业越来越暴露在外国市场的变化无常之中。在日益精细的分工体系中,手工工人的地位不断矮化,工作状况恶化(哈维,2010:171-172)。随着机器的进步与市场竞争的加剧,很多小业主陷入贫困,工人则在悲惨而贫困的环境下制造新分工体系需要的微小配件(哈维,2010:180-181)。人口、住房与就业的增长与分散,使得住家离工作地点越来越远,也加重了工人的负担。

第二帝国的阶级结构经历了一场转变,其方向是贫富差距扩大。商业与金融力量的巩固,工人与师傅之间的分离,以及去技术化的劳动分工,这些都加剧了阶级分化并产生了新的阶级不平等。在城市重组的浪潮中,不同的人把握机会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不同的。第二帝国时期的物价上涨从根本上影响了工人的生活水平,1866年之后的财政困难、公共工程停顿加上外国竞争,使巴黎工人阶级生活陷入困境(哈维,2010:189、245、254)。当时的有识之士哀叹阶级区分的永久化与日减加深,并且认为即使穷人并不憎恨富人,穷人本身的危险状况加上富者越富,必然构成对富人安全的威胁。除此之外,这个威胁还表现在地理分布上,空间改造表面上看起来开放了更多的空间,实际上却施以更多的区隔与封锁。“巴黎的转变——强制将工人人口从市中心移到市周边地区——使得首都变成两座城市,一座是富人之城,另一座是穷人之城……遭受剥夺的阶级在富人外围形成了一道巨大的警戒线。”“贫困的洪水在贝尔维尔高涨,奢侈品之河却在巴黎新区达到高峰。”(哈维,2010:293、300)

的确,巴黎的重建,工人以及大量人口扩散到新设立的巴黎周边行政区内,这些现象创造出有利于社会抗议的条件。奥斯曼的做法在当时受到了一些严厉批评,因为他的举动凸显了“老巴黎,奢华者的巴黎”与“新巴黎,贫穷者的巴黎”之间的社会与地理区隔,这种区隔被认为会激起社会暴动。贝尔维尔成为资产阶级所畏惧的那种共同体,警察无法深入其中,政府无法有效管制。新周边空间(如贝尔维尔)对巴黎公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形成了一种跨越职业的都市共同体认同,成为巴黎公社的基础。其中,邻里酒吧是个“问题”,工人乃至全家都习惯到酒吧里诉苦。酒吧顾客绝大多数是街坊邻居,与职业无关。酒吧本身可能是社会紧张的来源,当它成为放言高论的场所,社会秩序就受到威胁。第二帝国试图进行管制,但成效不大。(哈维,2010:161、250-256、234)

对超大城市进行社会控制并不容易。第二帝国是一个警察国家,其监视与控制的触角延伸极为深远,当局也试图控制信息的流通,动员大型宣传活动。但这个体系在巴黎难以有效推行,一方面是因为巴黎有着革命传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巴黎人口的庞杂与城市特有的复杂性(哈维,2010:157)。而一些试图增强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的政治举措,往往也会在特定条件下成为反抗力量的基础。比如,奥斯曼将巴黎市政府职务分散到各个行政区中,并且陆续在各分区树立起象征性建筑,企图借由科层化的控制体系来整合地方忠诚。对新行政分区的忠诚很快建立起来,但却成了底层草根民主的表现工具(哈维,2010:248)。城市景观长久以来一直在正当性与社会控制的建构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奥斯曼是安排景观的行家,永久性纪念建筑和大型庆祝仪式可以将民众对皇帝的支持动员起来,有助于支持第二帝国政权的正当性。然而,在景观所促成的统治文化与和平景象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不平静的迹象:“当从拉谢兹神父墓园与从贝尔维尔返家的群众汇聚成具威胁性的景观时,已预示了对政权的不满与革命的可能,此时象征的秩序也逐渐反转过来攻击自己。”(哈维,2010:220-235)

从根本上说,当资本流通完全自由放任时,竞争与技术发展齐头并进,并且将擦出各种形式的文化运

动与文化调适的火花,在这种经济体制下,要进行监视与控制势必极为困难。1860年后,鼓吹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成为政府的政策核心,官方对于福利、医疗与教育也进行了市场化转变,这种转变让人们感觉自己的权利遭到剥夺,同时也丧失共同体的感受,因此埋下1868年到1871年社会动乱的根源(哈维,2010:156-158)。奥斯曼的改造工程、土地投机以及帝国统治瓦解了传统的共同体意识,但未能代之以稳定之物。因此,巴黎公社可以诠释成一种企图重新找回已经丧失的共同体意识,重新回到过去被迫迁出的市中心空间,以及重新主张身为巴黎市民的权利的尝试(哈维,2010:237)。

工业、商业、金融业的发展与转变;移民与郊区化;劳动市场与师徒制的失去控制;房地产市场的转变;逐渐增多的空间区域与分区专业化;住宅的重组、社会福利与教育改革——这些都在压倒性的金钱计算的力量下结合,助长共同体意识与经验出现重大变化。这让社会上所有阶级对已逝的过去产生深刻的乡愁,当时的摄影师纳达尔坦承身处自己的国家之中,却感觉像个外人,“他们摧毁了一切事物,甚至连记忆也不放过”。共同体的消失或许主要源自传统社会控制体系的崩溃,而这种崩溃则是人口增长、居住隔离与社会福利未能赶上社会再生产空间的快速重组所致(哈维,2010:249-251)。比如,家庭与亲族组织的传统安全体系,在面对就业的不安全、悲惨的生活条件与巴黎生活中的其他病态与诱惑时逐步崩解(哈维,2010:218)。

旧日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被颠覆了,巴黎的转变足以使人对“老巴黎”的消逝感到乡愁与不舍,并造成共同体感受的普遍丧失。在奥斯曼看来,巴黎必须以国家的利益为依归,它是全法国的巴黎,甚至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巴黎,本身不应该形成地方共同体的权利和意识。奥斯曼想转变巴黎共同体性质的目的也许是对的,但它否认首都人民拥有自治主权却引发争议,并使许多工人与资产阶级倒向巴黎公社(哈维,2010:163)。对于很多巴黎公社的战士来说,参与公社的理由只是因为巴黎是他们的家乡,他们的共同体也应该拥有自由与权利。巴黎人是以小规模邻里、市区乃至刚成立七年的行政区为单位来理解共同体的,这种地方忠诚相当重要(哈维,2010:247)。

如前所述,哀悼之声随处可闻,并且通常伴随着疏离感和一股怀旧之情。而怀旧也可以成为强有力的政治武器,下面是当时产生巨大效果的一段论述:“我遭到驱逐,其他人跑来定居在那儿,而我的房子被夷为平地,到处都覆盖着污秽的人行道。这是一座没有过去,充满无记忆的精神、无泪的心肝与无爱的灵魂的城市,这是一座游荡着居无定所的群众与流窜着人类碎砾的城市,纵然可以发展为世界的首都,也无法拥有任何市民。”旧行业的消失、新行业与新所有权结构的兴起、信贷机构的出现、投机事业的支配、时空感的压缩、公共生活与公共景观的转变、粗野的消费主义、移民与市郊化所造成的邻里不稳定——这些都产生了令人不满的失落感,并且容易在新巴黎取代老巴黎的过程中引起全面的愤怒。奥斯曼在帝国权威的庇护下改造巴黎,让巴黎沦为堕落的资本狂欢场,当中所产生的紧张感绝非奥斯曼所能化解,而他的重建计划势必将招来政治与情感反应。(哈维,2010:276-282)

巴黎公社不同于巴黎过去的革命事件,部分是因为奥斯曼所进行的生活空间重组、劳动过程的剧烈转变、资本积累的组织以及国家权力的部署。如果没有这些,巴黎公社就不会以日后的面貌出现(哈维,2010:258)。巴黎公社运动有两个源头:一是帝国以国家力量的独断来碰触每个臣民,从被驱离于大道之外的街头艺人,到被排除于有利可图的城市放贷业务之外的部分银行家,无一不在它的掌握之中;二是资本流通与积累的力量也不断加快脚步,它以对巴黎既有环境进行创造性破坏的“残酷”手法,来转变劳动过程、空间整合、信贷关系、生活条件与阶级关系。权力与资本两个力量有时彼此互补,但终归是相互冲突。

1848年之后,国家力量似乎成了私有制与资本的重要支柱。然而,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现代性不可能从帝国传统中诞生,原来设想的全能政府无法应付全知的市场理性(哈维,2010:311-312)。

在1867年到1868年的经济不景气中,巴黎见证了法兰西银行金库中大量积累的资本过剩,公共工程与巴黎上层阶级房地产市场的停滞,以及物价暴涨所造成的激烈竞争与高失业率。经济不景气激起了各阶级广泛的不满情绪,成为1868年到1871年斗争的前奏。1868年6月开始了“非政治”公众集会,这些集会几乎集中在充满不满情绪的地区,政府的监控完全无法阻止这些集会转变成大众动员与政治意识提升的场所,这预示了巴黎公社运动即将出现。集会不只是不均匀地分布在巴黎空间中,连听众、主题也很快出现分化。巴黎北部与东北部由激进派、社会主义者与革命分子主导,成为民众政治鼓动的专属空间,是革命的根基。奥斯曼的大道成了新的战场,原本被资产阶级行人与消费者占用的空间,被不满的工人、店主与街头群众接管。巴黎公社的详细内容并不是本书的讨论范围,但哈维认为其中绝大部分根源在于第二帝国时期巴黎城市更新的过程与影响。巴黎公社是城市史上的一个戏剧性事件,“但真正供其燃烧的原料却是在资本主义缓慢改造巴黎历史地理的韵律中汇聚而成的”(哈维,2010:317-325)。

四、对中国城市变迁研究和超大城市治理的启示

19世纪后半期,巴黎发生了剧烈的空间变迁,大卫·哈维对巴黎如何走进现代性、成为超大城市的过程进行了专门研究,对资本与权力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及所产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批判。在当前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期,超大城市日益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城市类型,既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引领作用,又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人口膨胀、房价高启、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以及教育、医疗、治安等问题都使得这类城市不堪重负。尽管与19世纪后期的巴黎相比,当下的中国超大城市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发展阶段、历史背景与制度环境都存在显著差异,但是,我们在哈维的历史分析中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前车之鉴与发人深思之处。抛开巴黎这个案例,哈维在书中展现的研究方法和由超大城市而引发的现代性反思都在理论与实践上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

(一)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方法论

哈维(2010:22)认为,面对巴黎纷繁复杂的史实,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一件有用的工具,能用来理解特定时空下都市变迁的动力。通过对巴黎的实证研究,他也成功验证了这个工具的有效性。哈维是一个地理学家,又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所谓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就是要将历史唯物主义与地理学结合起来。

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虽然马克思也有关于空间的重要思想,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集中于从时间维度来考察资本积累在工业中运行的历史进程。哈维等人认为,这种理论思路背后有一种历史决定论,即所有差异都被历史决定论换算成了时间差异。他们认为,历史维度虽然在理解和认识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毕竟世界同时存在两个向度,即时间和空间。在城市化、全球化背景下,如果不考虑地理空间维度,就不可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与以往不同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矛盾焦点主要集中在物质商品生产和劳动价值分配上。然而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它的主导生产方式已不再是简单的物质生产,而是空间的生产。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城市房租的榨取、地价调节、对城市空间规划等行为所得到的剩余价值,远远超过了在工作场所资本对劳动力的直接剥削所得到的剩余价值。因此,需要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情况下,纳入空间维度,将“历史唯物

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武剑、林金忠,2013)。

资本主义从“空间中的商品生产”转向了“空间本身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已经转移到狭义的商品生产过程之外,这一点在超大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所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方法论对空间的引入能深化和扩展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胡大平,2014)。反过来,地理学是研究空间问题的传统学科,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也意味着将马克思主义带入了地理学,对于地理学和传统的空间研究范式具有重要意义。

地理学及相关学科对空间开展研究的典型范式体现在芝加哥学派的“人文生态学”和以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中。人文生态学借用生态学的概念和理论,强调空间演化中的生态竞争,从“适者生存”和“优胜劣汰”的角度解释空间的分化与变迁。新经济地理学派则将距离、运输成本等有关空间要素加入到传统资源优化配置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框架中。人文生态学和新经济地理学不考虑社会历史形态,不对空间竞争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之处进行批判。从竞争或经济理性的角度解释,所有的空间结构都是优胜劣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因而是合理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则是要对地理空间布局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将空间纳入商品经济的分析范畴,来研究资本主义如何利用空间这种特殊商品来追求利润最大化,以缓解其内部矛盾的,然后又在此基础上分析空间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被影响、被形塑的(武剑、林金忠,2013)。所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使实证主义地理学转向了空间政治经济学。

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地理学相结合,开展基于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开展超大城市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虽然我国的超大城市和资本主义超大城市在制度上有根本区别,但也面临着一些相似的问题。而且,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具体观点相比,更重要的是它在方法论意义上提供的启发:也就是应该重视空间问题,重视空间格局的经济意义与社会后果,在分析城市空间变迁时更加注重资本因素和权力因素。

(二)现代性与反思现代性

哈维对巴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除了提出资本和权力两大维度之外,还涉及现代性这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哈维在书中称巴黎为“现代性之都”,现代性与城市化存在着密切联系,超大城市更是高度现代性的产物。所以,对超大城市的研究与治理,要上升到现代性的高度,才能起到提纲挈领的效果。现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运行机理,它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现代性创造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并促进社会走向了理性化、规范化、一体化。但现代性也一直面临着质疑与反思,从韦伯关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析以及关于“铁笼”的论断到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从福柯的“全景敞视监狱”到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关于现代性的争论与批判从未停止(衣俊卿,2004)。

哈维称现代性是一种“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它将城市视为一个可以任意切割、刻画的空间,如果在铭刻新事物的过程中发现有过去的事物横阻其间,便会将过去的一切予以抹灭(哈维,2010:1)。在我们的超大城市的形成过程中也能看到这种现代性的力量,一种经济资本推动的大规模“破旧立新”。甚至在解决超大城市中的一些问题时,采用的也是这种现代性的思维,比如一刀切的“清理”、片面地追求“高端化”。这种现代性的发展模式 and 治理思路往往会破坏地方社会原有的生计来源、生活方式、关系网络和福利体系,容易产生不可预知的矛盾和风险。所以,哈维使用了“现代性的神话”这一概念,旨在对现代性思维中

内含的矛盾与导致的问题进行反思与批判。这给我们的启发是,在对超大城市进行治理时,要对其中的现代性思维保持清醒的认识与深刻的反思。

超大城市治理的一个核心思路应该是反思现代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现代性和超大城市。西方社会理论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基于启蒙现代性的辩证法给人类带来的悲剧性命运,一度表现出对现代性决绝的拒斥态度,而在当代,对现代性的建设性重写则成为一种重要趋向。面对各种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的激烈批判,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理论仅仅强调现代性的消极性和否定性是片面的,全盘否定现代性不仅不符合事实,也是错误的。吉登斯也明确地否认我们正在进入一种与现代性完全不同的后现代时期的说法,他认为我们并没有超越现代性,而只不过生活在它的一个更为激进的阶段上。当代社会生活的变迁只不过使得现代性变得更加纯粹、更加典型和更加激进而已(庞立生、王艳华,2007)。这个更加典型、激进的现代性,最集中地体现在超大城市身上。我们对待超大城市及其所体现的高度现代性,也应该采取这种“建设性重写”的态度。

对现代性进行“建设性重写”的一条路径在于非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即“另一种现代性”。随着西方现代性弊端的不断暴露,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不应再局限于单一同质的西方现代性,现代性的多元形态应该被发现和挖掘。在当代,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再盲目认同和复制西方现代性,而是立足于本土经验,对生活图景、发展观念、社会关系结构、制度设计和发展模式等,展开了现代性的本土化建构(庞立生、王艳华,2007)。过去中国的超大城市,有过度移植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倾向。今天,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处理好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超大城市发展模式与治理思路。这不仅有助于解决超大城市治理这个世界性难题,还将是对本土化的、非西方的现代性道路的一次重要尝试。

参考文献:

- 国务院,2014,《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http://www.gov.cn/xinwen/2014-11/20/content_2781156.htm,2014-11-20。
- 董慧,2010,《当代资本的空间化实践——大卫·哈维对城市空间动力的探寻》,《哲学动态》第10期。
- 高玉林,2015,《资本的空间限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空间批判》,《浙江社会科学》第8期。
- 哈维,2010,《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6,《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许瑞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胡大平,2014,《地理学想象力和空间生产的知识——空间转向之理论和政治意味》,《天津社会科学》第4期。
- 陆文军等,2017,《总书记叮嘱上海要答好的这道大课题:超大城市的精细化管理》,http://www.sh.xinhuanet.com/2017-04/29/c_136245377.htm,2017-04-29。
- 马克思,2009a,《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2009b,《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庞立生、王艳华,2006,《当代西方哲学与社会理论反思现代性的理路与趋向》,《社会科学战线》第7期。
- 强乃社,2012,《资本主义的空间矛盾及其解决——大卫·哈维的空间哲学及其理论动向》,《学习与探索》第12期。
- 唐晓峰,2010,《(序一)创造性的破坏:巴黎的现代性空间》,哈维,大卫《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武剑、林金忠,2013,《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及中国启示》,《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
- 新华网,2008,《法国首都巴黎简介》,http://2008.qq.com/a/20080321/000013.htm,2008-03-21。
- 衣俊卿,2004,《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赵海月、赫曦滢,2012,《大卫·哈维“时空修复”理论的建构与考量》,《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第5期。
中新网,2014,《中国百万人以上城市达142个 6个城市人口超千万》,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3-19/5968169.shtml>,2014-03-19。

Reconstruction of Space: The Birth of a Megacity

CHENG Shi-qiang

Abstract: The governance of megacity is a worldwide problem. David Harvey's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of megacity theoretically and carrying out its governance in practice. In his book, Harvey shows the reconstruction of Paris by capital and power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emphasizes the spatial dimensionality of modernity and urbanism. As a typical megacity, modern Paris epitomizes urbanism and high modernity. Harvey reproduces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Paris, and reveals how capital and modernity are combined at a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 and how social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are activated by this combination. Harvey 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of megacity as a spatial form, which reminds us that we should not only se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megacity and the specific problems existing inside it,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formation of this space form and the driving mechanism. In addition, the understanding and governance of megacity also require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and reflective modernity.

Key words: Megacity; Space; Modernity; David Harvey

(责任编辑:刘少杰、王水雄)